

## 《天主教與我》

在選定這則週末談的題目裡的詞序時，我曾有點猶疑，但聯想《國王與我》那個片名，就這樣定下來了，先“教”後“我”。

有朋友說我，自童年開始，就一直走着自己的路。這不單止過譽，也不符事實。成年前後那十年八年間，其實有着兩股力量影響着我。首先是五十年代的左傾思潮，我在早交代過了，於此不贅。另一股影響力，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，在各地結識和交往的天主教教會的女修士和神父。

### 一、六十年代的幸遇

1966年我在港大舉辦了一個為期一周的《漢語語言會議》。過程中，我結識了香港天主教瑪利諾會李重光神 (Rev. Thomas A. O'Melia)。是他介紹我到九龍界限街（喇沙書院）附近的一所叫友誼之家 (Friendship House ) 去教外國人粵語（廣東話）。來上課的主要是老師和護士。友誼之家的主持是法國女修士 Mère Marie Noëlle Monteil (1909-2016, 見照片)。就是在這個“家”裡，我認識了上一談中提到的故友羅能士和他的夫人 (Christiane Rowlands)。其時，她帶着三位年紀較輕的修女，一位法國人（已去世），兩位越南人，從西貢來港。迄今，我還跟那兩位越南修女保持聯繫。

這群天主教人士，在我赴法深造準備過程中，作了很多穿針引線的功夫。



照片右是 Marie Noëlle Monteil，左二是香港教區白英奇主教  
Lorenzo Bianchi (1899-1983), Sr. Nguyen Thi Sang 提供

## 二、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無私協助

1980年7月1日，我啟程到加拿大魁北克省，調查該省的原居民保留區，維蒙達奇（Weymontachie，意為“觀察的山頭”）。有關方面，把我安排住在尚-馬克·歐樂神父（Père Jean-Marc Houle）的住所樓上。那裡有幾個房間出租給路過的客人，因為保留區裡，連一家小客棧也沒有。我向歐樂神父詢問他教區裡聾人，比蒂貴女士的情況。他說比蒂貴兩個星期前，因肺病進了拉土爾克城（La Tuque）的一家醫院。無可奈何，我叫他給我召一架水上飛機的士，轉往另一個保留區去。沒飛機！那天是週末，天氣晴朗，都給從南邊大城市來的白種人租去打獵，要等下週一才能走。我悶得連到外邊逛逛也提不起勁。傍晚時，歐樂神父跟我說：“為什麼你不試試，跟比蒂貴的女兒談談？她很熟悉她媽媽的手勢。”他是故意等了一整個下午才告訴我這個消息。幾天以後，他坦率地告訴我，他要觀察一下，我是否和別的田野調查員一樣，到保留區來，把原居民們當豚鼠一樣做試驗品。

歐樂神父是上談提到的聖貞瑪麗修士會的傳教士（現網絡上譯作“無玷聖母獻主會”）。時年67歲，已在多個保留區工作了40餘年了，對原居民有深厚的感情，說得一口流利的科依語（Cree）。他是加拿大法語區的白種人。他的惟一助手，康拉特·奧基埃（Frère Conrad Auger，1904年生，該會的傳道兄弟“brother”）個子雖然小，但很結實。他隨從歐樂神父多年，很勤勞，所有雜務，除了開汽車外，都全靠他，是個任勞任怨的、值得尊敬的老教士。雖然我不是教徒，但我得說，在我調查的幾個保留區的過程中，這些教士們，幫我忙，照顧我。以維蒙達奇為例，如果沒有歐樂神父的接待和指點，我肯定錯過調查比蒂貴這個最後的、難得的機會。

最後，讓我說句我對這個宗教的體會。這麼多年來、在不同的地區和他們接觸，卻從來沒有嘗試引導我信奉他們的宗教。這是他們跟政治黨派的分水嶺，也是他們感染力所在處！

我對宗教的態度，首要的是尊重和了解，而不是信奉。對我國傳統的道教、佛教也如是。我覺得這樣才能包融，和谐并處。